

● 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词汇与文化

—— 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

赵滨丽 编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词汇与文化

——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

赵滨丽 编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汇与文化: 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赵滨丽编著. —哈尔滨: 东北林业
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81076-692-9

I. 词… II. 赵… III. 词汇-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英、汉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6475 号

责任编辑: 付 佳

封面设计: 彭 宇



NEFUP

词汇与文化

——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

Cihui Yu Wenhua

——Yinghan Ciyun Wenhua Neihan Duibi

赵滨丽 编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和兴路26号)

黑龙江省阿城制版印刷厂印装

开本960×787 1/16 印张10 字数177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ISBN 7-81076-692-9

H·22 定价: 18.00元

前 言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社会形成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同时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也不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外语与汉语之间的对比研究受到了重视。在最近的10年中，具体的语言对比，特别是英汉对比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版的英汉对比方面的论文、专著和论文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侧重于理论方面的探讨，有的主要为教学服务，但专门对词汇文化对比进行研究的书籍很少。尤其是有关英汉词汇文化对比、适用于大学生英语学习方面的著作较少，不是理论性过于强，就是过于广博。鉴于此，笔者有了写一本有关“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的书的想法。

在外语教学特别是词汇语义教学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阐述母语与外语词汇深层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注重语言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与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是不合适宜的，这样很容易导致学生在交际过程中语言运用错误，造成语言交际失败。因此，该书的撰写侧重于为外语教学服务，对汉族人学习英语以及掌握英语的人学习汉语都有重大的帮助。

笔者对英汉词语文化内涵研究十分感兴趣，多年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笔者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即属于这一课题。近年来，笔者还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专题的文章并从事有关这方面专题的教学，不断扩充内容，深入挖掘，从多方面进行英汉词汇差异对比研究，尤其是从教学中经常遇到的英汉词语差异、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研究，查阅、收集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写成了本书——《词汇与文化——英汉词语文化内涵对比》。

本书共分五章，着重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与文化内涵进行对比研究，对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词汇意义进行情感意义、比喻意义、联想意义等方面的比较，还对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如广告语、数字、颜色词、称谓语等进行对比。从理论到实践以及新时期英汉词汇的发展等都进行了探讨，材料丰富，内容涵盖面广，表达深浅适宜，是理论性、实用性、趣味性

融为一体的学术著作，不论初学者或已有一定素养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取营养。

虽然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尽心尽力，力求研究深入，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妥或不周全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5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1)
第二节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对英语词汇的意义进行研究	(3)
第三节 词汇与文化	(10)
第四节 英汉词汇层上文化的差异	(12)
第五节 中美主导文化模式差异及其影响	(14)
第六节 研究英汉语言及其文化内涵比较的重要意义	(18)
第二章 英汉词汇文化内涵比较	(20)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英汉词汇文化内涵	(20)
第二节 英汉词汇的联想意义及文化内涵	(21)
第三节 英汉价值观、审美观、行为准则及文化内涵	(24)
第四节 英汉民族的心态及性格因素影响其词汇及文化内涵	(25)
第五节 俗语积淀着人类文化创造过程的内涵	(34)
第六节 英汉礼貌用语及文化内涵	(34)
第七节 粗俗语及其文化内涵	(40)
第三章 英汉词汇使用差异	(41)
第一节 英汉颜色词的使用差异	(41)
第二节 英汉委婉语的使用差异	(54)
第三节 英汉数字和词的谐音文化审美差异	(65)
第四节 英汉喻体的使用差异	(70)
第五节 英汉习语、谚语的使用差异	(77)
第六节 英汉广告词汇的使用差异	(83)
第七节 英汉称谓的使用差异	(89)
第八节 英汉敬谦辞的使用差异	(99)
第九节 数字式略语的英汉差异	(104)
第十节 英汉词汇的文化空缺现象	(109)
第十一节 性别差异产生的英汉词汇文化差异	(111)

第四章 英汉词语典故及文化内涵	(115)
第一节 由文学作品人物演变而成的词汇	(115)
第二节 来自神话典故的词汇	(120)
第三节 来自体育项目的词汇	(128)
第四节 来自近代、当代的人物和事件的词汇	(130)
第五章 英汉词汇的发展	(133)
第一节 旧词语消失	(133)
第二节 新词语产生	(134)
第三节 新词语产生的方式	(141)
主要参考文献	(15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语言（也包括若干方言）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如尽管英、美两国民族有着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地理位置相隔，因此致使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产生了差异，从而导致了语言上的三个组成部分——语音、语法、词汇的差异。这三个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首先从语音上看，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位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某火车站不期而遇。美国人性格开朗，善于结交朋友，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就问：“What is your job?”英国人回答说：“I am a clerk.”美国人听了惊讶万分：“Clock? Your job is to tick all day long?”这种误会就是由于两国发音不同而引起的。同一个词，美国人念 [klark] 而英国人读 [klak]。后者在美国人听来，就成了另一个词 clock。在中国也是一样，陕西人把苏州人的“10块钱”听成“4块钱”。再看语法，如美国英语的动词 to get 有两个过去分词形态，一个是 gotten，另一个是 got。而英国英语只用 got 这一形式。再比如，西安方言说“多买几本书”，而广州方言则说“买多几本书”。最后从词汇来看，语言的地域差异常常在词汇中明显表现出来。如一位美国人乘坐一艘英国船旅行时，他要一份 biscuits，一心期待着能吃上可口的软饼干，可拿来的竟是硬硬的苏打饼干，不禁又恼火又纳闷。原来英国人的 biscuits 就是美国人叫做 soda crackers 的那种食物。于是他便让招待员送来 crackers。招待员一听，又瞪大了眼睛，原来英国英语里的 crackers 就是 fire crackers，意思是鞭炮。再如中国北京人管小孩叫“小孩儿”，江苏叫“伢仔”，长沙叫“细人子”。从以上可以看出，由地域差异所导致语言的差异。

语言的社会差异，是指语言成分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不同阶层的人，所受的文化教养不同，所属阶层、集团、行业、年龄、性别等不同，对语言的理解力必然也有差异，在运用语言时所出现的语音和词汇、语法、修辞和

语体等也有差异。不同社会阶层在语音和词汇的选择方面差异极大。美国语言学家 William Labor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纽约市各社会阶层的语言变异做了调查，他对纽约市三家不同级别的百货公司营业员的发音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在低级商店里元音后发 [r] 音的人占调查对象的 20%，中级商店里占 50%，而在高级商店里占 60% 以上。他的调查表明，上层中产阶级不论在随意说话还是在留意说话中经常使用元音后 [r]，而下层中产阶级只有在留意说话时才经常使用元音后 [r]。在词汇的选择上，美国一般人称警察为 policeman 或 officer，但居住在贫民区的男青年则用他们认为有蔑视附加意义的俚语词 cop、fuzz 或 the man 指警察。词法方面的特点也能衡量说话人的年龄、性别、身份。据调查，我国 2~3 岁儿童在使用反复问句时存在着一些成人语言中没有的格式，如“妈妈，我好不好孩子？”“大家都高兴不高兴呀？”从语体来看，我们举几句要求对方关门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是家人、熟人、生人、长辈、同辈、晚辈、上级还是同级或下级等的不同关系。

Shut the door!

May we have the door shut?

I wonder if you would mind closing the door?

I am sorry to trouble you, but could I ask you to close the door for me, please.

语言是传播的文化工具。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传播。语言融合的前提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尤其在当今更为开放的世界环境中，作为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文化表现之一的语言，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对语言发生巨大的影响，文化接触也会带来语言的借用乃至融合。这种语言上的相互借用吸收的对象主要是词汇。比如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接触，汉语从英语中借入了大量的词汇，如三明治、色拉、coffee、redar。趋雅、求新、尚异的审美趣味和社会心态也会影响到人们的语言运用。如时下流行的饮料、可口可乐 (coca-cola)、百事可乐 (pepsi-cola)、金利来 (Goldlion)、雪碧 (sprite)，这些使用译名所用汉字尽量表达相关意义，于是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语言——文化现象，就是根据音译词的字面意义进行仿用，译出的汉语具有美的效应。英语也有借自汉语的，如 tofu (豆腐)、chowmei (炒面)、(jiaozhi) 饺子等。由于国际间的交往频繁，信息交流快，商品产品多，外来语使用，因此简便的音译方法很快地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很多外来语已进入汉语系统，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你考试结果怎样？我 Pass 了。”

“电话在哪？我得回个话，有人 call 我了。”

在语言传播中，不论是语言的内涵还是外延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特征，要

想达到正确地交际和交流思想,必须对对方的民族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否则就会影响交际进行。有位学者曾这么认为,在交际中,文化因素甚至要比语言因素更重要。因为你在交际中尽管会出现某些语言方面的错误,如 He read books,但交际的对方能明白你的意思,交际可以进行,但如果你问美国人或英国人 What is your age? 尽管语言无误,但这次对话很可能就此中断。所以要想正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一定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如中国文化心理的明显特点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的个性,而强调群体的作用。而西方人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所以中国人见面好问“吃了没有、你多大年龄、你工资多少”等,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表现,是东方式的人情味。而西方人看来则是干涉了别人的“隐私权”。再比如,西方人到中国人家吃饭,中国主人会对西方客人说:“菜烧得不好,请尝尝。”在西方人看来这是矛盾的说法:菜既然不好吃,就不该叫人尝。这在西方人眼里也许近乎虚伪,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说:“语言交际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交际,有很多语言交际中的障碍与其说是语言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更为妥当。语言是文化构成的基础,语言对文化有影响有制约,文化是语言的管轨,文化必然制约着语言产生及发展方向。”

第二节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对英语词汇的意义进行研究

对比语言学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它是一门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是共时的,研究的对象往往限于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对比重点一般落在两种语言的差异上。对比的分析研究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可以从两种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进行对比;其次应把对比分析的重点落在语音系统、词汇语义系统、语法结构系统、修辞语体系统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的各个方面。词汇语义系统的对比有三方面的内容:①词义问题,实词的情况有时相当复杂,非得细致地逐一对比不可,虚词的掌握更要从语法结构里进行对比;②词义的感情色彩和修辞风格意义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应分别在不同的语境进行对比;③熟语(包括成语、谚语等)的构成也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关系密切,最好选择本民族语里与其意义近似的意译。在研究英汉词汇对比时,中国学者自然会更多地与汉语联系,所以在对比研究中,研究英语词汇和汉语词汇对比的学者最多,研究范围最广,取得的成果最多。更多的学者

是把英语词汇同汉语词汇进行比较研究。周文革先生于1992年在《湘潭师院学报》(五期)发表《试论汉英词汇间的“自由贸易”》。文章主要由汉语对英语词汇的渗透和汉语吸收英语词汇现象两个部分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之间频繁交往和进行思想沟通,每一种语言都不可避免地要吸收许多外来语,补充和丰富本民族的词汇,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有人把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为语言上的“自由贸易”。

第一,汉语对英语词汇的渗透。汉语词汇输入到英语语言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近代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线的开辟,英语被输入了新鲜的“血液”。由汉语直接输入到英语的词汇,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汉语的发音,它们的语音和单词重音基本上英语化了,其重音大多位于句首。新词、新语的创造不是偶然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了表达新事物、新思想、新感情,一些英语作家和学者借用了汉语中的部分词汇,并且大胆地创造了新词、新语,使英语词汇空前地丰富起来。

第二,汉语吸收英语词汇现象举要。汉语中有许多外来词语来源于英语。这些词语包括医药、宗教、化工工业、娱乐、计量单位、食物及风土人情等领域,其中有些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创造的,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今后,英语语言中还会出现新的“进口货”,汉语语言中同样会有更多的“舶来品”,这是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正是在英汉词汇“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加上本民族语言的不断发展,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最终成为了当今公认的、世界语言中词汇量非常丰富的语言。

借用国际贸易中的术语——“自由贸易”形象地阐述了这两种语言的相互渗透。

因为英汉两种语言对世界事物的“概括”及其在造词法上存在着差异,所以英汉两种语言的词语意义是非完全对应关系。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变得模糊不清。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反映文化的词语和习惯的表达方式。这方面的研究尤以邵志洪先生为代表。1993年邵志洪先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二期)上发表《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模糊性——从80年代的英语新词谈起》。由于文化习俗、背景不同,因此中、英两国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联想也不同。如以英语为原语、汉语为归宿语的词语,walking tractor(英语强调跟着走)——手扶拖拉机(汉语强调用手扶);chair days(英语强调老年总是在椅子上)——暮年(汉语强调天色早晚来比喻)。再看以汉语为原语、英语为归宿语的例子,涉及生命观念的“明哲保身”及“自身难保”用“身”字表示可以理解,可是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的“翻身”、涉及人背景的“出身”、涉及知识与领悟力的“体验”和“体会”、涉及道德

的“修身”及“三省吾身”、涉及树立榜样的“身教”等都是外民族所无法理解的，因此相同的所指对象和所指意义必须用不同的字面意义去表现，如汉语的“身不由己”字面上用“身”，而英语则必须用“意志”(will)去表达：*against one's will*。由于英汉词语意义方面存在着这种非完全对应关系，因此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变得模糊。英语新词与汉语对应词义之间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大。在文章结束时，邵志洪先生写到：“从造词法方面看，汉语的表意文字使造词法有寓新义于新词的趋势；而英语词义由于较多地依赖于上下文，一词多义非常突出，由于利用引申、比喻等手段寓新义于旧词，词义演变越来越宽。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对世界事物的‘概括’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反映民族文化的词语(culture loaded words)和习惯表达方式。”邵志洪先生对中英、中美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探索十分有益，学生要想真正学好一种语言，必须对该语言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1994年邵志洪先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期)发表了《“结合法”构词模式导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英汉特指动词缺项弥补比较》。他指出，英汉语言中一些特指动词的缺项通常可以通过“泛指动词(等成分)+特指名词”来表示。由于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结合法”构词模式，英语N→V转类法作为弥补英语特指词缺项的一种普遍使用方法；可使我们以更简洁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造成某种障碍。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语言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和语言文化因素的障碍。M. Cele-Murcia和D. Larsen-Freeman指出了英语构词法的三种构词过程：合成法、词缀法、结合法。结合法是指句子中的某个成分变成另一个成分的一部分。有一种结合法，其基于动词含义很广泛，它将名词宾语结合进去以表示增添某物、消除某物、将某物作为工具使用等。文章列举了七种类型分别与汉语表达方式作比较，例句中的英语通过N→V转类法对一些缺项的特指动词进行弥补，这是汉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无能为力的。然而同英语相比，汉语中绝大多数这类特指动词是缺项的，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较复杂的方法，也就是使用较多的词汇来弥补。汉语特指动词的缺项绝大多数需要通过旧词的搭配与组合来表达。英语中弥补特指动词的缺项通常可以有两种方法：①类似汉语，通过旧词的搭配与组合来表达，这种搭配往往是由“泛指动词(等成分)+特指名词”组成；②通过N→V等转类方法创造新词。英语中通过N→V转类法创造新词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由于各种语言的“结合法”构词模式不同，英语N→V转类法作为弥补英语特指动词缺项的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可以使我们以更简洁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造

成两方面的障碍；可以看到一步 N→V 转类法是单纯 N 转化构词过程的障碍；二步 N→V 转类法除 N 转化构词过程的障碍外，还有 N 语义转化过程或 N 联想搭配过程的障碍。尤其是当 N 联想搭配过程中涉及文化因素时，障碍更加明显。

1995 年邵志洪先生在《外国语》（第六期）发表《英汉词语搭配中的“可预示性”比较》一文，文章由两部分组成，词语搭配词项上的“可预示性”和词语搭配语义上的“可预示性”。英语 cliché 和汉语的“陈词滥调”有差异，即与词语搭配词项上的“可预示性”对英汉语言表现力影响的差异。英语中词语搭配一旦产生过分紧密的结伴关系，即明显的“可预示性”，往往有可能成为 cliché。因此，英语中的 cliché 主要是就词语搭配关系而言的，即与“语言性语境”有关。而汉语中词语搭配存在的十分紧密的结伴关系，即明显的“可预示性”，通常并不构成所谓的“陈词滥调”。什么是汉语的“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就是指“陈旧而空泛不切实际的话”。它并不是就词的搭配关系而言。所谓“不切实际的话”是与“非语言性语境”有关。英语的 cliché 主要有以下几类：① the inevitable adjective。英语中有些形容词成了某些搭配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词项，具有很强的“可预示性”，由这些形容词构成的搭配被看做是 cliché，试与汉语对应表达方法作比较：flat denials（断然拒绝）、bounden duty（应尽义务）。② the overused idiom。所谓 idiom，顾名思义，词项之间具有很强的“可预示性”。英语中一些 idioms 使用过多，久而久之成了 cliché。试与汉语对应表达方法作比较：a 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pick and choose（挑挑拣拣）。③ dead metaphors and faded similes，英语中一些陈旧的比喻词项具有很强的“可预示性”，被视为 cliché。试与汉语比较：a bolt from the blue（晴天霹雳）、as cold as ice（冷若冰霜）。④ the pointless allusion or dead quotation。英语中一些引喻（allusion），比如出自《圣经》或神话、寓言等故事的引喻，使用过多，久而久之成了 cliché，试与汉语比较：cry wolf（喊叫狼来了——发假警报）。英语中的一些引语（quotation）引用过多，久而久之也成了 cliché，比如出自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引语：a rose by any other name（用其他名字命名的玫瑰）。词语搭配语义上的可能出现“可预示性”，这在英语中被称为 tautology（同义反复）。英汉在对待词语搭配语义“可预示性”问题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英语词语搭配中通常避免出现“同义反复”，而汉语词语搭配中却往往使用“同义反复”。汉语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四字格”成语的“并列结构”中前两个字和后两个字属“同义反复”，如“安家落户”（settle down）、“厚颜无耻”（impudent）等。英语成语中也有类似的“并列结构”，最具代表性

的可以说是“nice and…”这个搭配。然而它在语义上起的是强调作用，如 nice and convenient（很便利）、nice and peaceful（很平静）等。英汉两种语言客观存在这些差异，我们就要对它们加以研究。英语搭配中随着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性减少，词语的表现力也就相应减弱；而如果汉语搭配中的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性减小，并不会对词语表现力产生大的影响。

1999年邵志洪先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二期）发表了《近20年来英汉词语互借对语言文化的影响》。近20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英语作为载体，将最新世界科技文化内容以词化形式大量借入并影响汉语。不少英语新词直接以英语形式出现于现代汉语中。在借用过程中，影响汉语语义的因素包括：①英汉词义不完全对应，如汉语由 action film 产生了“动作片”这个新词，致使原来与 action 词义不完全对应的“动作”产生了新义；汉语“友好城市”随英语 sister city 被称为“姐妹城市”。其实在这种用法上英语 sister 与汉语“兄弟”更相似。按照汉语习惯，上述“友好城市”一般应称为“兄弟城市”，而不是“姐妹城市”。受 sister city 的影响，汉语中出现了“姐妹城市”，使原来与 sister 词义不完全对应的“姐妹”产生了新义。②英语词义变化导致的影响，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英语词义演变导致的影响，Godfather 的原汉语对应词是“教父”（孩子受洗时，承担其宗教教育的人），新词 Godfather 的汉语对应词还是“教父”，但词义却随 Godfather 转化，现在“教父”可以用来指在一个组织或团体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物；二是英语词义在构词中变化导致的影响，home cinema 指的是“在家里放映电影的系统”，home cinema 在美国称为 home theater。cinema 和 theater 在 home cinema 和 home theater 中词义都变化了，从原来指“地点”变为指“设备”了。汉语中根据 home cinema 字面产生了“家庭影院”这个名称。这种影响与变化会产生很奇怪的汉语表达方法，如“购买家庭影院”，指的是购买这样的“设备”，而不是一个“电影院”。通过邵志洪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知，我国科技文化引进的多，输出的少。由于英语借用汉语词语在数量、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局限，就相互影响而言，汉语对英语的影响远小于英语对汉语的影响。邵志洪先生是这一时期用对比语言学理论研究英汉两种语言词汇的代表，研究内容涉及两种语言的多方面，观点新颖，成果累累。

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过程中，一种语言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出于表达的需要，也往往吸收这些民族语言里对自己有用的部分，这就是语言中的“借用”现象。民族间的战争、征服、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都能导致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促进它们之间词语的借用。

朱少华先生于1995年在《现代外语》（第四期）发表《英语中汉语粤方

言借词研究》一文。文章指出,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 189个之多。英语中含有音译成分的汉语借词,按其语音源可分为五个方面:①源自古汉语语音的词,如 silk、china 等;②源自汉语粤方言的词,如 sycee、typhoon 等;③源自汉语闽方言语音的词,如 tea、pekee 等;④源自汉语官话语音的词,如 yamun、kaoliang 等;⑤源自汉语普通话语音的词,如 jiao、dinghao、kong fu、wushu 等。源于粤方言的借词主要有四个方面:①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有关的汉语粤方言借词,如 cohong (公行)、额设商行,源自“公行”(gong hong)。“公行”是中国政府为限制外人商业于1720年在广州设立的对外商进行贸易的组织,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被取消;pakapu (白鸽票)源自于“白鸽票”(banggebiu),1910~1915年进入英语,“白鸽票”是旧时广东等地经济活动中发行的彩票俗称,英语中也拼写成 pak - a - pu 或 pakapoo 等。②源自与中国饮食、服饰文化有关的汉语粤方言借词,如 chowmein (炒面)源自“caomin”,1903年进入英语,主要用于美国英语;samfu (衫裤)源自“sam fu”,20世纪进入英语,“衫裤”是指中国女士穿的包括短上衣和裤子的套装。③源自于中国特有物产有关的汉语粤方言借词,如 qonams (湖南产红茶,又名湘红)译自“wunam”一词,1860~1865年进入英语;longan (龙眼)译自“lung gan”,1788年进入英语。④源自与广东地名、居民、语言、物产有关的汉语粤方言借词,如 swatoy (汕头)、hakka (客家人)、canton china (广东瓷)等。朱少华先生在文章中对源自汉语粤方言的借词作了一番介绍和探讨,这些探讨能帮助对此有兴趣的学者和语言爱好者更进一步地研究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了解汉语在英语词汇扩大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文章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语粤方言对世界语言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英语和汉语属于根本不同的两种语言,一种属于印欧语系,另一种属于汉藏语系,两者相差甚远,但两种语言都存在名词转换成动词的语言现象。1996年司显柱先生在《外国语》(三期)发表《英汉名转动词比较研究》一文,对词义上有何特点、修辞上有何特点、使用现状怎样,以及原因何在等问题进行研究。文章说,英汉名转动词在来源渠道的共性是,两种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均为名转动词。司显柱先生把不同的方面归纳为:①汉语的名转动词几乎全部源于基本词汇,而英语在各类词汇里都有反映;②汉语的名转动词一般只来自单纯词中的单音节词,而英语中的名转动词,含有单纯词中的单音节词(如 to pig)、多音节词(如 to radio)、复合词(如 to strong - man)等。③汉语中名词转动词只发生在普通名词中,而英语的名转动词则在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中都有反映。英汉语言里都大量存在缩略词现象,但由于汉语的名词转动词一般只发生在单音节词中,而汉语缩略语又至少是双音节

的,如“政协”、“安理会”等,故汉语的缩语词不可能转为动词,而英语则可以。总之,英语名词转动词表现出较汉语词类更大的广泛性和宽容性。在名词转为动词的过程中,词义的转移是通过引申和比喻两种方法实现的。通过引申法获得的英汉名词转动词的词义结构均可粗略地分为六类,但属于两种语言共有的语义结构只有四种,另外两种语义结构是英汉各自所特有的,这证明两种语言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英语中,使用比喻方法实现名词向动词转类过程中的词义转换,主要表现在以表示事物、动物、人体器官的名词上。通过借用这些名词代表的事物、人物等形象特征,来喻指所表达的人物的行为、动作。汉语的情况与英语相类似,也主要表现在表示事物、动物、人体器官的一类名词上。名词转动词的修辞色彩主要表现为言辞简洁、精炼;语言表达生动、形象。英语名词转动词的修辞特色:使语言表达精炼,避免行文的冗长拖沓;使语言表达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并富有诙谐幽默色彩。汉语名词转动词的修辞特征与英语同类相似,也表现为遣词经济和措词生动形象。通过将名词巧妙用作动词,或讽喻,或其他比喻,用词生动形象,感情色彩浓烈,修辞效果明显。司显柱先生在文中明确表明,英语中这种名词转动词来源渠道的广泛性特征,意味着它可以在各种不同语体及语境中使用。汉语中的名词转动词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出现频率上都远不及英语。这样的总结性结论可以帮助读者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和英汉互译能力。

人称代词无论在哪种语言中,都是语言交际中举足轻重的语言成分,因为该词类有着其他语言成分不可越俎代庖的用途。代词照应是使文章前后呼应、意义连贯的主要方法之一,因此有学者就英汉两种语言的人称代词的这种呼应进行对比研究。1997年刘礼进先生在《外国语》(第六期)发表《英汉人称代词回指和预指比较研究》一文,英汉人称代词回指就是复指或后指,预指就是前指。英语人称代词与句子中另外一成分构成预指关系是有条件的,名词(先行词)所在结构等级必须高于代词所在的结构,即预指通常只出现在代词所在结构等级低于先行词(被照应词),因此“先行词”并不先行。汉语代词预指式用法通常在汉语中是不符合习惯的,汉语一般采用复指式。人称代词回指表达式是英汉语句法上通用的词语接应方法。英语人称代词预指表达式往往出现在前置的从属结构中,汉语句子更多地使用人称代词回指式,预指程度较低。任何语段或话语必须以线性形式向前发展。话语的发展导致“新信息”不断被补充;同时为了保持语句之间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人们必须使用一定量的“旧信息”,但是旧信息的利用必须以不覆盖新信息为“临界线”,代词回指语便充当起“淡化”旧信息的角色。英汉两种

语言中的人称代词回指程度都很高，但英语比汉语更高。人称代词回指表达式是英汉语言中词语照应的重要手段，在使用人称代词连句构篇这一功能上，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人类相同的思维、相同的理论基础，即语言表述经济性。刘礼进先生对英汉人称代词回指和预指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说明，英语和汉语有着以人类认知和思维为基础的语言共同性，两者之间有差异，但并不太大。这就有助于读者了解代词本身所含信息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必须借助文章内部其他词语来准确解读其义，找出两种语言中有关人称代词的回指与预指的共性和异差有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好英语。

第三节 词汇与文化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二是文化词汇与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则是间接反遇，如汉语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等”。

将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研究与描述，这无疑对于教学特别是对外语教学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将这些词分离出来，称之为文化词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不是一般词汇，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词汇。实际上，不仅红、黄、白、黑、松、竹、梅是一般词汇，龙、凤、华表也是一般词汇，它们具有其他一般词汇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类词较好的处理方法是从小词入手。

对于词汇意义通常作“指示意义”（denotation）及“隐含意义”（connotation）的区分，例如，在英语中 politician 的指示意义是“从事政治，关心政治，特别是以政治为生涯的人”，它的隐含意义是“不讲原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言善辩，言而无信”。通常词典上只给指示意义而不给隐含意义，因为指示意义是比较固定的，而隐含意义可以因人因时而异。隐含意义是通过联想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从事政治的人在竞选时采取各种手段争